

马克思主义文论 与中国问题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ND CHINA ISSUES

金永兵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马克思主义文论 与中国问题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ND CHINA ISSUES

金永兵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问题 / 金永兵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039-6684-2

I. ①马… II. ①金… III. 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研究 IV. ①A811.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8116号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问题

著 者 金永兵
责任编辑 蔡宛若
书籍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100700）
网 址 www.caaph.com
电子邮箱 s@caaph.com
电 话（010）84057666（总编室） 84057667（办公室）
（010）84057696—84057699（发行部）
传 真（010）84057660（总编室） 84057670（办公室）
（010）84057690（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2.25
字 数 3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书 号 ISBN 978-7-5039-6684-2
定 价 48.00 元

此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词及当代意义研究”(项目号:18ZDA275)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 录 | contents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命题

- 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命题 / 3
- 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历史意识 / 10
- 创新的路径依赖：术语革命 / 18
- “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作为新时期中国文论命题 / 27
- “后革命”氛围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革命话语 / 36
- “回到马克思”与当代性建设 / 43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时代挑战

- 主体的黄昏 / 67
- 当代文学的中华美学精神 / 117
- 时代文艺的浮脉 / 157
- 建构中国网络文艺理论话语 / 164
- 后文化时代，审美还能诗意地批判和拯救现实吗 / 175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话语

当代文学理论家与他的时代 / 205

激活毛泽东文艺思想话语体系 / 229

文艺“问题式”的时代新变 / 236

为中华文化复兴铸魂 / 262

习近平文艺论述的理论品格 / 278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异域镜像

共同体的建构 / 289

伯明翰学派与英国“文化—文明”传统的比较 / 305

异在性艺术与感性解放 / 324

人的复活与审美拯救 / 340

附 录

访谈 1：“为文学”而“溢出文学”的文学理论 / 353

访谈 2：建构一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学科 / 369

后 记 / 380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 中国命题



中国命题，标志着研究主体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的本土意识。强调本土意识，并不只是应对所谓“失语症”的现代压力的问题，而是要真正去认识并应对本土现实问题的挑战。在唯西方是尚之时，本土问题很容易被忽视，同样，本土问题也很容易在抽象的理论演绎与逻辑思辨中被搁置。事实表明，本土问题才是推动理论发展最直接的现实动力。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而言，本土意识要求研究主体自觉地强化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当代意识、历史意识与创新意识。当代意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所应具有当代性诉求，即全面而深入地贴近当代现实，在充分关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当代命题，从而不断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注入鲜活的生命力。据此，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建设便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必然要求。这一要求又与历史意识、创新意识内在相关。就历史意识而言，我们需要深入辨析文学理论研究与历史意识的关系，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命题纳入中国的历史语境之中进行思考，需要分析当代中国的“回到马克思”趋向以及“回到”的是哪一个或什么样的马克思等问题；就创新意识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需要不断以创新推动发展，而创新的路径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术语革命”，这不仅关乎研究方法的革新，还关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整体发展。

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命题

马克思曾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这些重大问题不仅仅是对个人的牵引，同时它也要求一种学说与思想实现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和理论表述，形成自己的理论命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其实是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革命的武器和批判的武器，直面中国波澜壮阔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而形成并发展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效地实现了现代中国文论的历史使命，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阐发效力并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命题，譬如，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的“源”与“流”的问题，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典型问题，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问题，文艺的艺术标准与政治标准的问题，文艺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人民性问题，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民族艺术与中国气派的问题以及现实主义文艺的诸问题，可以说，这些理论形成了一套革命历史时期的独特的文论话语。无疑，这些文论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它们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科学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文论和美学命题并没有全部被直接挪用，譬如经典作家那里提出的诸如艺术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的问题、艺术生产的问题、美的规律的问题、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的问题等，以及在特定时期并没有转化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命题。并且，上面所提及的中国现代文论命题也不全是直接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论命题，有些是基于中国社会特定文化现实的新的发展。这里，马克思主义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它总是存在于各种历史的具体的理论实践之中。

杰姆逊在谈到很多西方现代文论，例如后结构主义的历史时指出，有的虽然不能归属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但它们并不能远离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们“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1]“人们当然可以脱离

[1] [美] 詹明信（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 页。

历史而谈后结构主义文本本身的价值，但是如果你想在更大的语境中弄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你就得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框架。”^[1]杰姆逊关于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强调，一方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本身，也要求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中结合自己的时代问题去进一步展开和拓展理论思考。抽象地说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是固守某种教条和特定时代的理论命题与理论表述，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如何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高高悬浮于空中的思想，而能够落地生根，却是要有具体理论实践的，这就要求其必须深深植根于时代具体问题的阐发。

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还是在中国现代文论那里，很多的问题和命题本身今天仍然具有现实阐释效力，换句话说，其“问题性”依然存在。譬如，“为谁写作”的问题，今天理论界不再提出所谓“工农兵”方向，但是，这个问题在今天的时代并没有消失，它决定着一个作家的良知与职责，决定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走向和精神高度。这个问题已经转换为新的理论命题而焕发出新的活力，例如“新左翼文学”、“人民美学”、“底层叙事”等一系列理论命题虽然未必很准确，但彰显的仍然是“为谁写作”、“文学为什么人”这种文学理想和价值诉求。同时，新的时代必然

[1] [美]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

有新的时代问题：全球化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全面扩张，互联网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全球恐怖主义和生态危机等超越“冷战”和核阴影成为新的人类问题，等等，如果没有对很多重要的时代关切的深入研究，理论便失去其价值与效应。

毋庸讳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固守传统理论而缺乏大胆创新的弊端。当我们回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时，除了特定的历史弯路之外，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在建设阶段它缺乏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锐气、力度和阐发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挑战，没有先见之明地提出成熟的理论命题；另一方面是很长时期以来，大量的研究精力都被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者中国现代文论的理论命题的研究上去了，尽管这非常重要，但缺乏对自己时代问题的强烈责任和深入研究，所做的努力很容易走向“本本主义”，没有现实的问题意识，单纯的温故难以知新，难以有新的拓展。譬如，20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曾迎来了人们空前的高涨热情，但是，当时提出的理论基本问题也多是重复之前的理论命题，诸如文艺的所谓“写真实”的真实性问题、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等，形成了一时的理论热点，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某一阶段理论的“拨乱”以达到“反正”的目的，起到了思想革命的某些作用，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要

务和贡献所在。当时的讨论乃至争论本身也没有提供多少更新鲜的内容，并没有超越前人，也没有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和命题。因此，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大量涌入，这些略显陈旧的理论话语和理论问题便“读来已觉不新鲜”，失去了效应。在与这些西方新潮理论的碰撞和交锋中，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渐渐处于守势，被西方新潮理论制造的话题和热点，诸如“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等所牵引乃至裹挟，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理论的定力、自主性和提问能力。并且，这些新潮理论本应被改造、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机成分，却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无法形成自己的理论命题而无法让这些新潮理论成分被吸收并安得其所，甚至导致它们的喧宾夺主，从理论问题本身到人才、学术资源，不断冲击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

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会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存在形态，更不用说用以阐释不断变化的社会及文化现实的人文社会理论。恩格斯曾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在这里，所谓创新就是实事求是，回避这种创新的使命，是一种懒汉主义。以杰姆逊为例，他说，“贯穿我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著作的框架来自我所身处的时代本身”^[1]，这个时代的“变化当然主要是经济社会方面的，比如全球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论”“给了我一个融会贯通的框架来审视这一切，把它们理解为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逻辑”。^[2]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与杰姆逊所关注的时代变化和时代问题在他那里有了一个真实的结合。

如果说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武器的批判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的任务是使用其“批判的武器”真正完成文化的批判与建设。这里不是要所谓“告别革命”，不是所谓今是而昨非，而是要直面新的时代命题，其理论重心要做应有的转移。“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据时代的需要将自己理论重心转向“文化哲学”，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其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在我看来，一个基本的工作就是寻找到当代中国的时代命题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审视它们，形成自己的理论表述。譬如全球化及其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关系问题，人道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人的主体性确立的问题，文学的个人性与公共价值的问题，文艺的形式革命与意识形态问题，大众文化与艺术生产问题，消费文化时代文

[1] [美]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页。

[2] [美]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页。

化消费的平等权问题，主流文化与文化领导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并不都是之前的文论所遭遇的，但是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予深入的思考和解答，自然就把理论阵地和理论领导权拱手让人。

作为时代政治和思想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是时代现实的一种特殊的观察视角和思考路径，只有作用于其所身处的时代才能彰显其独特价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找到时代的真正问题，形成理论命题，以“术语革命”实现当代形态文论话语系统的建构。

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历史意识

文学理论是历史生成的知识话语，本质上属于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的结果来研究的“第三类科学”，即历史科学。因此，文学理论的研究，必须要有历史意识，要把它放在历史情境中，放在一定的历史关系中，充分历史化，通过对过程的阐明，获取认识的真理性的。非历史性的研究结果往往缺乏科学性的内在依据。

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意识至少可以包含下面四个基本内涵。

第一，逻辑（理论认识）结构必须符合历史发展进程。譬如，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的研究逻辑，完全符合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样，人们对文学理论活动的思索，对它的研究分析，往往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即从事后开始，从文学理论发展过程的结果处开始。这种思维习惯，要求我们有历史意识，必须求得文学理论认识逻辑与其自身历史发展本

质上的相一致，才能建立文学理论科学的、发展的、统一的整体。就是说，文学理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文学理论研究的思想进程便应从哪里开始；历史发展到哪里，其思想进程便应发展到哪里。

第二，文学理论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它表现为一个过程。对文学理论认识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在本质上是相对应的，因为文论研究只限于了解一定社会、国家、民族和时代中的文学情况和后果，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具有暂时性。因此，对文学理论来说，离开了历史的观点，也就离开了科学本身。在这个领域，“谁要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1]。无论是文学内容、文学形式，还是各种文学观念从来都不是永恒的，只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文学理论研究中根本不存在普遍主义的结论，面对任何新的现实、新的问题、新的冲突与矛盾，都要重新研究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材料，通过对它们的分析，从中得出结论。因此，研究任何文学理论问题时，要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使每一单个问题的解答都能自然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从而推进认识的不断深入。因为结论如果不能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无用处，以前的结论只具有启示的意义，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0页。